

嚴迪昌編著

近代詞鈔

壹

江蘇古籍出版社



壹

江蘇古籍出版社

近代詞史札論

代前言

這部《近代詞鈔》共選編長短各調之詞五千五百餘闕，入錄其作品的詞人爲二百餘家。據知今尚存見於海內外公私藏家的該歷史時期的詞籍，總量極爲可觀也極其繁碎，以詞作篇什計或以詞人數量計均將數倍於此。所以，僅憑個人微薄之力所能編著的此種《詞鈔》，誠不算宏富。只是近代詞的全編之役，恐非短期內得能奏其功，與其曠日以待，那麼先提供一部稍具規模的選鈔之集，對詞史的進一步探討或作家作品的廣泛研讀，諒不無參酌價值。

選鈔的過程實亦讀詞過程，選事既畢，茲移置讀後札論於書端，權充前言如左。

一

作爲特定歷史階段的指稱，「近代」一詞的概念迄今猶存爭議，尤其是在年代上下界限的劃定上。歷史無疑處在流變態勢中而終始不間歇，社會性質的演化亦每是劇變與潛移互爲啓端及終結，抽刀斷水必也甚難，執其一端更難周全。於是，當移植某一歷史概念到文學或文化發展的過程時，上述困難度似尤大。

文學史固然亦屬歷史之疇，可是文學發展的史程與以社會性質演變爲指認的歷史行程並非是相互可能取代或借假，兩者有時很不同步。簡言之，社會動變以至性質的轉換，與文學最直接相切攸關的是：心態的隨之刺激而起變化，表現題材亦因之調整並漸見增減。

但是，心態的起變不會迅捷倏忽，如影隨形般隨之社會遽變而頓然更新。人們的意識形態從悚然有驚到見微知幾，中經幾番悵惘、幾番迷茫，甚而幾番疑惑，從而進到幡然省悟，奮袂搏擊，此一次舊納新的歷程乃是個漫長漸進過程，它不是一次事變、一樁事件的強刺激所能完成於朝夕之間。

在歷史的長河中，數十年時間猶似石火電光，與傳習相承的觀念於心底積澱的過程相比，那真是太短暫、太倏然。何況自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到宣統三年（一九一一）這七十年間其實仍處於

愛新覺羅氏王朝原有框架形態中在運行。固有的傳習本够冥頑，加之體制的箍束，即使大智大勇者也難以輕易解縛而脫，這原需要幾代人的苦鬥，必也經歷多少回的拉鋸。

至於文學現象，特別是體式穩定，實踐操作已多慣性的古老體裁，若詩、文、詞這些作爲人們抒情述志的主要文體，其創作實踐猶受自身格式所制約，故其演進狀態更不易與社會性質之變化軌迹形成同步。此種感覺上的滯後現象，詞這形態較之詩與文似尤爲顯然，尤其是在風雲多變、災禍頻起的晚近時期。

可是這焉能成爲指摘詞家們不力的理由？同樣，用某一史學框架來繩定或一種文體的功過並予以褒貶，似也不是歷史主義的公道。

事實是，即使滯後也並非是凝止。人世間的一切事物莫不始終處於運動狀態，否則必也消亡。詞這一特種詩體在人們指稱爲近代的歷史階段同樣呈現於運動態中，只不過較爲隱蔽，沒有大起落的哄動效應。然而，深細的梳理整合和認真的探覓開掘，豈非正是文學史家的天職？偏嗜固然不宜，陳見或泥於某一範型，甚而先虛構一種理論模式來對應觀照，無疑均皆會窒礙史識。

所以，如果不是簡單化地在原不可互易取代的文體之間擅定橫向的共時性比較值；同時又不刀一刃切辦法以社會性質的階段劃分來劃開文學文體的斷代史程，而是盡可能按特定文體本身發展過程作爲觀照，貼近其史實的時空存在真象，那麼，如「近代詞」之確認指稱就或許不只是歷史學上的分期名詞機械前置於一種文體而已。「近代詞」應該不僅僅是「近代」這一歷史時空間存在過的

詞，它而且更應是這一特定文體在該段歷史時空裏繼續運動的存在標識，是詞的歷史的階段性現象和內涵的指稱。文學是歷史構成的組合料之一種，歷史研究不可或缺或參照之對象，但文學不應是史的附庸，更不能是史學的附庸。唯有如此，始能在繁碎雜亂的詞文獻舊紙堆中，清整出其所具有的不可取代也不能重複的價值來。

說文學文體的運動演進有其自身的軌跡，絲毫無意排除或無視社會政治經濟的興衰演替對文學的影響和制約。恰恰相反，文學原是人間煙火薰蒸和胚育而成，所以，這種制約和影響是無法抹煞的客觀存在。只是制約既是深層的，影響又是內在的。唯其是深層內在的，因而每每却是無比敏銳的。於是，在社會人文、經濟的整體階段性演變歷程中形似滯後態的文學，却在社會啓變的起始之際表現出有獨異的超前性。「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心靈的新銳感知，包括朦朧的甚而是莫名的潛意識感知，無不泛耀出超前性光芒，而這正是文學生氣活力的脈源所出。才智之士原是最多此種感知的先行體驗者，民族歷史文化的精粹哺育和陶鑄了他們知幾於微的靈慧聰敏心性。至於超前體驗各自所可能作用於文學實踐中的程度以及效應反響之巨細，則決定於不同的才慧人士的能量差異以及契機得失，各有主客觀條件。縱觀中國文學史程，類此例證不勝枚舉。詞史亦不例外，清代中葉以後詞的啓變湧動於衰頹之勢，即爲又一例證。所謂啓變於衰頹之時，實即詞界內部的自振、自新或謂自救運動。只不過這場着眼點不盡通同的反思和棄舊圖新的詞林改良潮流並不始自鴉片戰爭之時，而是早於此前至少三十年。

清詞自乾隆中期以後即呈轉衰之勢。也就是說從厲鶚（卒於乾隆十七年）、鄭燮（卒於乾隆三十年）、史承謙（卒於乾隆二十一年）等謝世以後，幾無堪稱自構面貌的大家名家出現，詞學觀上也無卓識新見的提出，儘管詞人羣湧，詞集汗牛充棟。而以社會政治經濟機制的運行言，乾隆四十年左右起也顯然表現為滯頓、下滑頹勢。這不是現象性的比附，也不是巧合。封建極權的一再強化，個性禁錮必然日益嚴酷，這猶如窮奢極侈與哀鴻遍地原是事物共生現象一樣。弘曆的「十全王朝」殆同一架大熔爐、一張大羅幕，凡才慧之士不是羅網，就是順服，要麼夭亡，要麼變態。皓首窮經固不失為寧靜的逃淵藪，同時也畢竟算得自我價值的一種尋覓；至於閒情逸致的清夜自味，雖不一定能真的藥石無聊，但總也還是生存獲得的方式。人生價值、生命意義的探討熱情，在無奈中日趨淡化。即若在山靈水秀、雄關大河的境界中，一己的情志也鬆弛不開，激越不得。在那樣的歲月裏，心頭的戒律本已够多，這聲律體製既嚴而又名為「小道」的詞，是不可能喚起才士投以太多心力去關注它的盛衰命運的。性不耐制約却又只得與種種制約斡旋以求得一線性靈快慰的袁枚不耐依聲填詞，卓具史識又才情甚富的常州人趙翼亦不作詞，即是很可尋味的現象。

鬱悶伴隨着沉寂，自省也無可遏制地從鬱悶氛圍裏悄然興起。乾隆末年到嘉慶前期，詞界的反

思未曾間斷。其中張惠言和郭麐是異地同時反思自救的兩位有深度的詞學家，從某種程度講，他們堪稱新一輪詞林起衰振頹的啓蒙人物。

張惠言原是常州學者羣體中成員。學人大都視倚聲爲「小道」末技，如該羣體的老一輩耆宿莊存與、莊培因等即不聞有詞，與張惠言齊名的惲敬也不存詞，如李兆洛則亦僅存少作，可是張惠言却被尊爲常州詞派」的開山宗師。這究竟是怎樣的契機？張氏的建樹也只是編了一本《詞選》作了一篇序，而前後同時代大型詞選問世甚多，辟「豔詞之或涉於淫」之類主張也不少見。如較早的有夏秉衡刻於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的《清綺軒歷朝詞選》，接着蔣重光的《昭代詞選》三十八卷刻於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此外刻成於嘉慶初年的還有姚階、張遠春等的《國朝詞雅》二十四卷、許寶善的《自怡軒詞選》等。而鼎鼎大名的王昶則在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輯刊了《琴書樓詞鈔》二十五卷後，到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又先後編纂成《明詞綜》、《國朝詞綜》以及《國朝詞綜二集》。何以這麼些身份聲望均遠較尚在安徽歙縣金榜家坐館的一介寒士張惠言要高的選家，沒能足移一代詞風，倒是薄薄一本刻成於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初只爲供學童作爲學詞時讀本的《詞選》反成爲後人奉爲圭臬的經典？這大概也算是際時運會，張惠言順應了一種時代情緒，率先在詞的領域鑿開滯礙的淤泥積磊，給以注入一帖強體增力之劑。

今天看來，張惠言及其弟張琦所倡導的主張，無非是常州學人將「今文經學」、「公羊學派」的經世致用的觀念導入詞創作領域，強調「意內言外」，言之有物，摒棄浮詞、游詞、豔詞之類玩物喪志或

文字遊戲的陋風而已。但在當時，「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的立論却有警世的普遍意義。以素被視作「小道」的詞體也欲「尊」其功能，乃是人們心頭共同期許的振頹興衰意識的濃冽的反映。所以，它其實是嘉慶初年衰世之兆日顯時經世致用思潮的派生，是「修、齊、治、平」觀念又一次在文學領域的折射。換句話說，是淡化已久甚或是被壓抑甚深的憂患意識在詞體功能問題上的渲泄。如果注意到清代嚴酷的文字獄案件中幾乎沒有波涉到詞這一文體的創作，即沒有「詞禍」這一事實，那麼在禁網漸鬆之初率先把「微言大義」引入詞苑，提倡「寄託」之「意」，不能說不是意味深長的。

這無疑是一次進步。而且張氏的尊體說並非僅屬個人見解，它有普遍共識，至少也代表了上面提及的常州學羣，包括還有如劉逢祿、陸繼輅、左輔等等的認可。但是張惠言死得太早，他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八上禮部試始成進士，三年後即病歿，年僅四十二歲。《詞選》在其生前事實上未有大影響。其詞學觀始能廣為傳播需俟三十年後《詞選》重刊以及周濟、董士錫等的鼓揚。然而常州第二代詞學家在發揚光大張惠言之說時，或者着力於達到理想審美境界的可操作模式的探求，或者強化「寄託」手段而過於導入經師解經的習慣性敏感。至於張氏力主的「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的諷世、警世、醒世的潛在追求意識却轉被淡化，除了受過常州學人師授的龔自珍講過「詞出於《公羊》學」之外，後世稱為「常州派」的詞人對此略無闡釋和發揮。

弊病其實一開始就隱伏着，這就是張惠言在確認審美理想時慕古情結太堅緊。於是，毋論是他以溫庭筠為最高範型還是後來立周邦彥為詞家極致，均泥於一尊，企慕不二。這對本就擬古、泥古、

摹古習氣極其濃重的詞界無疑會再次推波助瀾。而「微言大義」的探求在創作實踐上的導向深密奧澀，必然與詞作批評的深文周納同步推進。結果這些傾向在信奉者那裏一定愈演愈烈，直至季世仍未熄歇。

郭麐是詞界反思甚力的又一位啓導者。這位世稱「浙派後勁」的著名詞人，力主喚回藝術個性，抨擊「性靈不存」而「嚆然自異」的風尚。他的《靈芬館詞話》，特別是文集《靈芬館雜著》中的大量序跋之文，見存有許多識具「通變」的論說。惜乎此君位卑身賤，晚年仍靠坐館謀生，奔波於江南江北，後期詞作又散佚。故其交游甚廣，名聲不小，但影響力却不大，挽轉不了「浙派」種種成見傳習，尤其是後來譚獻諡以一個「滑」字，晚近幾乎泯滅了他的存在。郭麐詞學觀的沉寂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嘉道之際衰枚「性靈說」文學思潮受到摧頹的「殃及池魚」。其實這個曾師從姚鼐却不甘俯從「桐城」，詞作淵源「浙派」而又陣內反省的郭頻伽本應有所獻添的，「性靈」之泉原亦可能濟一脈生氣活力於詞苑。習慣勢力，「正宗」意識實在太頑強了。

張惠言和郭麐對詞的功能探討及反思，正是某種危機感在詞的領域的隱潛申發。它表明衰頹之勢無可否認地確已見在，不然無須如此張皇；同時又佐證，詞界仍在運動，並有一定冒突，衰落原非僵枯。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應該是治史者嚴切關注的一年。毋論從清代的社會政治歷史，抑或從詞的發展史程予以審視，這一年均呈現有續斷起結的轉化現象，人與事發生着歷史性更變。

鴉片是導致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頹垮的黑色速朽劑。封建王朝速朽云云，當然只是一種表述的便捷。按之「煙禍」的酷烈，其摧垮的力度是全方位的。財力的巨耗，標誌是白銀無休止外流；民力的剝蝕，要害在身心的萎靡難振；至於百官臣工，由於鴉片這一中介物的湧入，或蠱惑得更顛預，或誘導得更貪婪，或戕毒得更昏聩。總之，其害危及整體國力，而在那個歷史階段，國力的盛衰與民族的存亡是不可分割離析的同一命題。所以，對鴉片的嚴禁與弛禁，乃是攸關國家民族整體命運的大事，是一切善惡是非、忠逆正反等等道德標準和行為准則的基本測定標尺，同時也是決定着與以堅船利甲相裹脅的西方強梁如何外交的癥結。從後續事態的演進即歷史的軌迹看，道光十一年是關鍵的年頭，清宣宗旻寧這一年明確嚴飭各直省督撫嚴行查禁鴉片，形成具有全國規模的第一次禁煙高潮。正是這一役禁煙行動，波瀾推進，終於匯聚成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林則徐等凜然焚煙的歷史性之舉。

如前所述，詞的史程並不是社會政治的史程。在歷史大背景下，詞界有自己運轉足跡。令人饒

有興味的是，這道光十一年在詞界流派演轉過程中同樣是很關鍵的年頭。老成凋謝，中堅頻失，習慣於講崇尚流派的詞壇頓感沉寂蕭條。

郭麐卒在道光十一年，同年「浙」、「常」二派名宿相繼去世的還有杭州的李堂、常州的董士錫、丁履恒以及方履錢等等，一時出現了明顯的代換輩移的嚴峻現象。文學的歷史離不開文學實踐的人的歷史，說不需審察文學家生卒行年也能講史，那是昏話胡說。

當時面對詞人多作古的事勢，項鴻祚即曾感慨不已，在《徵招》「冷鵲啼落西湖月」一闕的小引中他說：「年來江湖詞客子律、西齋、頻伽相繼下世，余以多難閉門，騷屑特甚，倚聲及此，蓋不獨牙琴之悲，黃墟之痛也」。子律就是著《蓮子居詞話》的海寧吳衡照，西齋即李堂，其《梅邊笛譜》一集飲譽浙東西，素稱詞苑耆宿，頻伽是郭麐之號。「詞人可憐老去」，項氏在詞中的一聲長號似劃下了一個時代的句號，不到四年，他自己也僅以三十八歲之齡逝去。再過四年，周濟死，剛胚胎成詞派只不過三十年歷史的常州詞人羣，在周、董之後，實無巨擘相接。所以，當浙西詞壇消沉之時，常郡詞羣也呈現間歇不景氣之象。當周濟卒後只二年，即道光二十一（一八四一）年，世稱「近代文學開山」的龔自珍也在丹陽遽逝。

從有清一代詞長期呈現詞派迭起，競領風騷的景觀言之，自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之後，是有十年以上的相對無序狀態存在於詞林。流派既需凝聚力，更需有領袖式代表人物，否則必渙散不振，不成其派。流派原乃文學發展的產物，是一種審美追求、藝術主張處於成熟期，生命力旺盛的現象，

而且每是應運而生，乘時而起。因而，流派間競爭摩盪一般均能鼓促文學創作及理論有所推進，有其積極的歷史作用。可是，當流派處於停滯狀態，某些羣體一味醉迷某種模式，失去流變性格形爲板結僵硬之勢，甚而盛氣凌人，以門戶之見欲定於一尊時，其負面消極影響必也巨，危礙作用也就發生。由此而言，流派影響消淡，並非壞信息，它或正意味新的變更和格局的又將出現。無格局狀態是能構架出充溢活力的新景觀的。在習慣性常規視覺中似乎羣龍無首的少序甚至無序狀態也許却是新的潮汐漲來的前夜，是一個新歷史階段的不可或缺之預前期。

鴉片戰爭爆發前至少有十年的時間，從詞史歷程審視，不應視爲清代中期詞壇衰頹的後續，而該是近代詞史的啓端。事實上這一時期也正是鄧廷楨、姚椿、周濟、周之琦、顧翰、龔自珍等一大批有自家面貌的詞人創作實踐的旺盛期。

只要不是把視野局限於流派現象並據之以論全局，那末定能發見這一歷史啓端階段並不寂寞。這十數年中有識之士既不少，在對詞史的返顧及現狀的反思中，真知灼見誠也不少。如鄧廷楨就有很高明的見地，似在爲不久亟需的「特立之操」、「清剛雋上」的詞風預爲召喚。他認定「蘇軾高華沉痛，遂爲石帚導師。譬之慧能肇啓南宗，實傳黃梅衣鉢矣」云云，這不啻發覆詞史奧秘，掃撥去「浙派」等堆籠在姜夔詞上面的迷霧（石帚與白石爲二人，其時尚未辨清）。如此高揚東坡風格，以及他還爲稼軒詞風澄清偏見，凡此之類在當時均屬空谷足音。可是人們往往只注意及他在廣州在天津的與林則徐的倡和，却輕忽這位名臣的《雙硯齋詞話》及其他相關的論述。其實鄧廷楨年齡也只小

於張惠言十四歲，較周濟還大六歲。又如選編《心日齋十六家詞選》的周之琦，譚獻以爲他「未及舉文、保緒之陳義甚高」，那是胸中先橫有偶像的偏見。且不說周之琦詞作成就高過張、周，即以其所表現的關於詞的史識言，就不同凡常；「大抵宋詞閑雅有餘，跌宕不足。長調則有清新綿邈之音，小令則少抑揚抗墜之致。蓋時代升降使然，雖片玉、石帚，不能自開生面，況其下者乎？」看似側重在討論慢、令詞體功能異同，然透發其中的見解極爲卓特，他不認爲宋詞一切都達到極致，高不可比。宋詞也可議其「不足」，詞論史上能見到幾位這樣的理論家？至於說周邦彥、姜夔在詞創作某些方面也「不能自開生面」，尤非胸中搬去偶像不辦。周之琦論詞而着眼於「時代升降」，在道光年間文化背景下誠難能可貴的了。可注意的是周之琦僅幼周濟一歲，二周的詞學建設的實踐乃在同時。再如龔自珍，他的詞論述更簡捷，在《長短句自序》中只拈出「尊情」二字，然而這恰恰是要害之爭。殆如龔自珍在《書湯海秋詩集後》申述詩的觀念「一言而已，曰『完』」一樣，定庵正是憤慨於時風流弊之多，僞飾、多空枵、多塗繪。「尊情」豈非就是對戕害真情現象的反撥？「詩與人爲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其面目也完」，「尊情」也即「完」。順便值得一說的是，這一時期如鄧廷楨等固無門戶之見，即若常州詞羣在張惠言死後，其門弟子也並不像同、光年間「常派」中人那樣嚴守「家法」。如「常派」後來每以「南北宋」孰爲上乘之爭，力貶姜夔、張炎來噉嘲「浙派」，事實上張惠言沒有一味深抑南宋詞風，其傳人也無一律貶姜、張傾向。如與董士錫一起受詞學於張惠言，「皆守常州詞派一脈而真能得其師承者」（董觀庵語）的蔣學沂在《藕湖詞自序》中轉述其師語：「先生之言曰：『詞者詩之餘也。詞學

始於唐季六朝，至南北宋爲極盛」云云，並謂「余服膺先生之訓，爲之有年」。同邑莊圻題《藕湖詞》云：「詞家白石是仙人，七寶樓臺隔幾塵。誰解鑄金稱後起，似君肝膽最清新。」以爲蔣氏詞有白石風味，《藕湖詞》實亦如此。可見該詞派初始階段強調的是「古之人境遇之抑塞，憂所鬱紆，用筆命意，歸之至約而出之幽側」（張惠言語），雖持論甚嚴而歎解人甚少，但却無意定一規以蓋遍詞界。

總之，其時有對操持、情志的召喚，以至橫議，甚而吶喊，但無定於一尊的家法。而呼喊與橫議既表明細縛心頭的繩索已先在才士身上開始鬆解，禁錮與網羅正受到各層面的衝擊，那麼，重新凝固在一種新的規範的趨奉，顯然不是這個時期的高明詞家所能認可的。

無序的詞界與滄海橫流的年代大體同步。儘管上述例舉之詞學見解及他們的創作實踐，經六七十年的烽火歷煉後，一俟略可苟安時又被汨沒於傳習之見和門戶排撻中，但不管怎樣都得承認：近代詞史的始端景觀甚爲精彩紛呈，從通變視野看去，「詞人可憐老去」只是現象的一端而已。

四

從道光到宣統五朝，按舊時干支紀年中經二次庚子年，這就是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和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前一個庚子，鴉片戰爭爆發，虎門血濺，定海失陷，國人開始飽嘗「夷氛」凌辱的

人生；後一個庚子，八國聯軍陷津、京，兵火在華夏民族心頭鑄上了空前未蒙的國恥。這是災禍深重、苦難無盡的六十年。白骨向天，餓殍遍野，廟堂孱弱，洋夷狡凶，際此之世，每個具血性、存天良，心繫家國和民族安危之士，莫不爲之沉痛、悲慨、憤怒、號呼。於是，作爲心靈載體的文學諸樣式，共奏起一組奮爭民族尊嚴的愛國大樂章，士人們以自己的才力投入哀生悼世的實踐，他們的心魂溶進了民族的命運搏擊行列。這六七十年時間既然是我華夏民族第一次經受嚴格意義上的外侮的考驗，那末，其抗禦外侮的精神和行爲，無疑是第一回真正的愛國主義。

向被視爲以柔婉綺麗爲主基調的詞，在這血與火交迸的時代大動變中令人欣慰地並不顯得滯後。從龔自珍的一卷《庚子雅詞》，到以王鵬運爲代表的羣體唱和《庚子秋詞》，框架起了前後兩「庚子」之間絢爛的詞史卷帙。詞憑借其固有的所能運載的功能，顯呈出毫不遜色於姊妹文體的時代性和文學認識意義。這在通代詞史中並不多見。

估衡某一文體在特定史程中的價值，本不應以簡單的數量統計作爲依據。誰會去計數南宋詞中有多少岳飛「怒髮衝冠」《滿江紅》式的詞章，從而嫌其不多而降貶一代詞作的存世意義？同樣，是否直接表現時事題材也不該成爲評估詞人的價值尺碼，你能判定辛稼軒「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的《摸魚兒》類型的吟唱，乃遠離現實的作品？

所幸近代時期的詞不必破費這種辯解，也能體現其認識價值。直接吟寫幾次入侵戰爭，謳歌和哀悼抗禦外侮而壯烈獻身的民族脊梁，傷撫戰亂頻仍中民不聊生、流離失所之苦，等等，凡此諸類的

詞作真正不少，而且作者層面極為廣泛。林則徐、鄧廷楨的唱和詞固多關係到禁煙和抗英之役；當定海再陷，吳淞戰敗，陳化成、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以及姚懷祥等殉國，其所激起的悲慨壯烈的哀歌，更是滲合入豐厚的愛國情思的組曲。此中有黃仁《水龍吟·弔陳蓮峯提督化成陣歿吳淞口》，有朱葵之《滿江紅·挽陳蓮峯軍門，敬次岳忠武韻》，有湯成烈《水龍吟·輓姚履堂大令懷祥殉難定海》，有姚氏房師周開麒《洞仙歌》的歌贊昔日門生的正氣之篇，更有名不見經傳的包汝量、陳幹等人的招魂之曲。追悼逝者乃為激奮生者，緬懷先烈也是為的召喚今世之人杰。所以近代詞中湧現的重新禮贊岳武穆以至文天山的篇什並不是無謂的懷古，其意義正同於謳贊時賢中的英烈，故不該輕忽端木塚、易佩紳等直唱到清季的此一類詞作。

特別應該表彰周閑及其《范湖草堂詞》。這是位「磨盾草檄」於定海浴血戰中，親身投入軍伍行動的出色詞人。言近代詞而缺漏周閑，猶若論近代詩史竟刪去貝青喬，豈非令人不可思議？何況周閑更貼近戰事。《范湖草堂詞》中，如《月華清·軍中對月》之寫前沿陣地氛圍，《水龍吟·渡海》之寫海路軍旅活動，《憶少年·夜抵上虞驛》寫寒夜行軍時之淒緊景象，無不真切、靈動、蒼涼、淒清。此外更有《征部樂·領健兒戍郭津》、《沁園春·大寶山朱將軍桂祠堂》、《塞翁吟·金雞山是謝將軍朝恩戰場》、《大酺·陪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三帥夜餞定海城樓》、《夜飛鵲·重上招寶山對月感舊》等等，或速寫於現場，或追記在事後，無不足稱詞之史，堪為長短句大增異彩者。

一直到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十一年（一八八五）的中法戰爭，詞苑猶有張景祁《新蘅詞》中的一